

【從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記憶政治】座談會發言稿

范雲

首先謝謝主持人，還有台社季刊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座談。今天我想講的其實是一點心得，因為我覺得白色恐怖這樣的議題，相當龐大，很難只用一種方式去理解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：「麥浪麥浪麥成浪，救苦救難救飢荒」？有聽過這詩句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？……我想可能除了白色恐怖史料的工作者有聽過之外，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。1949年當時的台大有有一個「麥浪歌詠隊」，他們利用寒假做環島下鄉之旅，在台中演出時，楊逵熱情地歡迎他們，當場即興朗誦了這詩句。從詩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，在1949年經歷了二二八後，像楊逵那一代的作家，對年輕一輩的期望。

我自己也是到非常晚近，脫離了學生身分，受惠於像藍博洲做得很多歷史紀錄，才讀到這樣動人的故事。當我是一個台大學生的時候，我為什麼完全不知道這樣的故事？我剛剛才從捷運站走路過來，經過台大醫學院，我想到，1949年1月台大麥浪歌詠隊，他們除了下鄉去做巡迴演唱，透過下鄉的過程中到每一個縣市與各校學生積極串聯，甚至成立一個類似像台灣學生聯盟的雛型。然而，也因為這樣的舉動，讓當局非常地擔心，所以才有後來我們所知道的「四六事件」。

1949年的四六事件就是，一位被捕的師大學生會主席，在他經過台大醫學院的時候就立刻跳下三輪車脫逃，衝到醫學院宿舍裡面高喊特務抓人，然後被宿舍裡的台大醫學院學生所保護。後來台大跟師大的學生就集結在師大的學生宿舍裡共同開會，糾集了兩三百人，在那裡跟軍警對抗了相當長的時間。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對抗呢？他們是用餐廳裡面的碗筷跟盤子從樓上窗口丟下來，跟軍警對抗。最後的情況是很多人都被捕，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在逃亡之後也被處刑。

說這個故事，我覺得，非常的遺憾與悲傷。我們是到了很久之後，才有機會認識這些史料。大學的時候，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對學生的理想主義的確有一種嚮往，但那時候我們讀的是Berkeley的故事、西方60年代的故事、甚至是韓國學生運動的故事。對於台灣自己的歷史，我們最遠只能了解到保釣運動。為什麼我們旅行到Berkeley人民公園時，會去照一張相，然而，卻對我們身旁經過的這些空間一無所知，我們從來不知道它發生過一些年輕人的、集體的、理想主義的行動。

今天談記憶政治，到目前為止，或許二二八的歷史記憶、地景政治已經被慢

慢地浮現。可是直到現在，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，卻還是在台灣內部權力鬥爭的場域當中，並沒有被我們的年輕人真正認識到。因為今天在場有蠻多年輕朋友，所以我想先從一個年輕人的角度談。

後來我在看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故事時，覺得也蠻有意思的。他們那時候唱的是什麼歌呢？他們先唱黃河大合唱，後來發現地方有一些歌謠也很好，所以之後也加入了很多台灣歌謠。整體曲目相當多元。他們的組成份子本省外省籍的同學都有，外省籍的同學教唱很多中國歌曲，本省籍同學則教唱台灣的歌謠。我就在想，這些事發生在 1949 年，但二二八事件是發生在 1947 年，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本外省組合也讓人覺得別有意思。

我也想提一提跟白色恐怖有關的性別觀察。我曾把藍博洲先生在 1998 年出版、由台北市政府委託的台北地區政治受難者調查報告，拿出來仔細地算一遍，發現裡面一共有 21 位女性。那她們的組成大概外省本省一半一半。在背景上，外省女性有許多是教員，我猜想這或許跟我們在紀錄片裡看到的那個紀老師蠻像的。她原本教國語，後來鼓勵他們組織工會、爭取薪資平等。而本省女性，則很多都是學生或工會的參與者，像許金玉女士這樣子。她們的年齡都相當的輕，幾乎都小於 35 歲。相比之下，二二八的受難者幾乎清一色是男性，女性在這個悲劇中是扮演受難者家屬，在漫漫長夜裡寡母孤兒茹苦含辛地隱忍。白色恐怖的女性角色，有像許金玉、蔣碧玉這些被我們看到的故事，但也還有更多我們所沒有看到的部分。哪一天這些多元的女性故事能夠真正地被我們理解呢？

像紀梅珍這樣一個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來的教員，剛剛的影像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，許金玉講的一話很有意思，她說：「人家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了，那我就要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」。所以，她去問紀老師：「老師妳可不可以教我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？」結果，紀老師說，「我沒有能力回答妳這樣的問題。」這段對話對我而言，是個困惑，也讓我對紀老師這個人的生命故事非常好奇。如果有更多像這樣的故事能夠被聽到、被理解，那我相信我們會有很多的收穫。

談到我剛才所說的白色恐怖跟二二八在族群、性別、甚至在階級這些部分的多元性之外，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，最大的困擾是，我們要怎麼去理解，什麼是 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精神遺產。不管是紀念、哀悼、或者討論白色恐怖，我們最終都必需面對的問題。我自己勉強整理出三個層面來跟大家交流：

第一個，其實還是從一個非常基本的部分談起，二二八跟白色恐怖，在事件的形式上、範圍上、以及意義上非常地不同，抗爭訴求也不太一樣。白色恐怖是更系統性地、透過軍警、體制性地鎮壓，不像二二八，可能是很粗糙的、一開始就是軍隊直接的力量。但是，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，仍然有一個延續性的部分

必須要被 recognize，就是威權政體對它的人民的鎮壓。所以，如果要討論白色恐怖留給台灣社會的精神遺產，最重要的仍是在這個事件中，我們感受到民主跟人權是我們最珍貴的 lesson。

民主它真的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，它是我們所聽到、看到那些活生生的、自己土地上的歷史，從今天看到的紀錄片裡習來，和我們在課本中裡藉由討論抽象的價值所學到的民主，是非常不一樣的。在紀錄片中看到的，人面對不正義的死刑與槍決的心理狀態各方面。所以我覺得，白色恐怖的故事，它其實是在用一個活生生的歷史，告訴我們，沒有民主跟人權，對人跟人性的傷害可以到多大。

今天我們把民主當成共識，這句話講來很容易，可是看看我們自己的歷史，它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過程。但是，那從另一個角度來講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很正面的部分就是，台灣社會雖然曾經經歷過這麼多殘酷的鎮壓，卻還能夠在數十年後由下而上地產生一個民主化的運動，這就算在世界的歷史上，也是非常地難得的。

第二個，是關於白色恐怖的獨特性。前面也談到，包括那時學生的訴求，是反壓迫、反飢餓、反殖民。前面也有談到，50年代的這一群人，他們的政治行動，其實是一個左的、一個紅色中國的理想主義。在今天的台灣社會，要如何能夠持平地去理解這紅色中國的理想主義的實質內容？我覺得這個持平的理解的努力，就會是我們今天談白色恐怖的重要精神遺產。

剛剛講到「左」的被誤解，其實真的有很多的故事。有一個受難者他被關了一段時間，他當初真的是無辜的，軍警到他家來搜索的時候，找不到任何證據，後來發現一本書叫「湯姆歷險記」，然後這本書就成為他是左派份子的重要證據。因為軍警發現作者叫馬克吐溫。這故事當然很好笑，可是也很悲哀，因為一個以左作為壓迫對象的軍警特務，卻根本不了解左到底是什麼東西。事實上就是這樣的體制跟政治，讓我們整個社會對左翼的思想長期污名化、恐懼化，尤其是對左的無知，更是對台灣社會持續的傷害。

所以，在理解白色恐怖事件本身的理念跟理想的同時，也等於在清理白色恐怖統治為台灣社會所帶來的負面資產。第一個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對左的無知，因為對左翼思想的無知，也使得我們對整個資本主義缺乏批判的能力。第二，它也連帶使得我們的政治體制對帝國主義的霸權缺乏反省的能力。第三，在這樣的負面資產中，它進一步讓我們在兩岸冷戰的結構中思想貧乏，使我們對所謂的祖國或中國，不管是追尋、依附、排拒、或迷惘，呈現出錯亂多元的狀況。對於應當怎樣去面對中國或祖國，我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。但是我覺得，理解白色恐怖，就必須清理這些白色恐怖統治所遺留至今的負面資產。

也只有清理之後，我們才能真正地持平去理解，當初 50 年代的那一群人，是爲了什麼樣的理念而參與這些政治行動。如果我們不能了解他們的理念，我們也無法了解很多人對紅色祖國的情懷，同樣地，我們也會無法了解當代的中國是如何轉變成今天的樣子。就如同我們不了解紀梅珍是怎麼樣的一個女性，爲什麼她會從中國大陸到台灣，爲什麼在許金玉問她那樣的問題時，她是給那樣的答。因此，我認爲，釐清與理解這個歷史迷霧的過程，就會是一項精神遺產。

第三，對我個人而言很重要的一個白色恐怖的精神遺產，就是，一個人爲了信念而犧牲的那種精神的高貴性。

我們常常講平反，平反當然困難，可是事實上要對曾經被傷害過的傷害作平反，這件事情可能還相對容易；但是，若要對人曾經努力過的意義作平反，是一件高度困難的工作。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，有一個東西我們必須面對，就是有人是因爲無辜而犧牲，但有人是自願爲信念而犧牲；這兩者在精神意義的層次上是非常不一樣的。對大多數人而言，當我們面對別人因無辜而犧牲時，很容易感同身受，我們就是不平，而這種發自不平的支持、以及情感的認同，可以產生很龐大的力量。可是當我們看到有人願意爲他的理念而犧牲，甚至是從容就義時，我們則感到徬徨無助與渺小。我們無法去理解那樣的一種精神狀態，我在想，這或許也是很多人至今仍不能理解白色恐怖的重要因素。

回來看台灣社會的精神與文化狀態，從日據到國府，我們精神文化長期被摧殘，很多部分其實已經變得相當扭曲。這在很多文學像陳映真或黃春明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。我們很多人心中有委屈哀怨，但我們還是要趨炎附勢、依附權力；我們要下一代出人頭地，但是出人頭地仍是爲了個人的功成名就。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的精神文化，我們非常需要去了解，這個社會、這片土地上曾經出現過那樣精神的高度。我覺得這是白色恐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遺產。

最後，我很簡單地結語，我覺得白色恐怖的這些先烈們，是我們歷史沙河中，被淹沒與埋葬的點點珍珠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，齊力將它打撈起，然後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。

謝謝。

（錄音謄稿整理：沈昌鎮）